



新世纪长篇小说研究

王春林 著

北京文艺出版社

王春林题



新世纪长篇小说研究

王春林 著

北岳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新世纪长篇小说研究 / 王春林著. —太原: 北岳文艺出版社, 2006.5

ISBN 7-5378-2878-4

I. 新... II. 王... III. 长篇小说-文学创作-文学研究-中国-当代 IV. I207.42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6) 第 041948 号

新世纪长篇小说研究

王春林著

*

北岳文艺出版社出版(太原市并州南路 199 号)

www.bywy.com

山西创元彩拓有限公司制版

太原彩亿印业有限公司印刷

*

开本: 880×1230 mm 1/32 印张: 12 字数: 300 千字

2006 年 5 月第 1 版 2006 年 5 月太原第 1 次印刷

印数: 1000 册

*

ISBN 7-5378-2878-4

I·2802 定价: 26.00 元

清洁的声音

李 星

尽管没有一个作家（包括标榜所谓最清高的作家）不关心批评界对他作品的评价，但却少有作家在公开的文字上对批评界及批评家的劳动给于公允或庄严的评价。这些年少了，至少在上世纪八十年代，一些大作家或准大作家还常常在言论中表示出对于中国当代批评界的不屑，尤其对于常常给予“外面”作家好评，而对己冷淡的批评家，他们常常以“捧臭脚”、“吹捧家”、“喝洗脚水”之类恶词给以不顾身份的攻击。因而有的大学甚至出现过关于当代文学的批评文章不能算论文的咄咄怪事。正因为如此，最近偶从一本书上读到江苏作家赵本夫在一篇叫《夏日》的小说中，借主人公之口，积极肯定当代文学研究与批评的话，便十分感动。当新上任的女书记奇怪这位锐气风发的青年研究者为什么选择了当代文学时，他说：“搞古典文学，现代文学研究的确容易出成果，可我认为那是一潭死水，大多是有定论的东西，研究来研究去，不过是修修补补，没意思。而当代文学却是一条流动的大河，是活水，虽然泥沙俱下，却正是需要别的眼光，在千百件作品中，你发现了一部好作品，在成千上万作者中，你发现了一个作家，那才真正有意思，那才真叫成果。”^①作为小说主人公，这位叫杨川的人对古典文学研究、现代文学研究的偏颇是显而易见的，但他对当代文学研究创造性劳动的理解，却是尖锐而深刻的，有对一种普遍而长期的学术偏见的矫枉过正

的意义。这些见解由一个小说家嘴里说出来，更为不易。（须知将近二十年来，赵本夫并未得到过江苏或全国批评家的格外“照顾”，不仅没有，甚至有些冷落。）正是同赵本夫同样的理由，我特别看重青年研究者王春林多年来同步追踪中国当代作家作品创作的专注精神和一丝不苟的研究姿态。

批评和创作之于文学尤如车之双轮，鸟之双翼，只有保持基本的平衡关系，文学才得以进步和发展。但在中国，这种平衡关系却常常被人为地损害。在“文革”前及“文革”期间的几十年中，它们要么是一种法官和被告的关系，要么是一种政治上的共谋关系。在市场化的背景上，它们又很快受到消费时代过分商业化的损害。遵命式的批评，圈子化的批评，炒作式的批评，包装式的会议批评，严重毒化了文学批评的生态，也损害了批评的公信力。像王春林这样，目无旁鹜，始终保持着一个学人的边缘姿态，客观冷静地对最新的作家作品发表自己意见的人，实在不是很多。所以他的研究、他的声音也就格外可贵，格外值得珍惜。这是一种不能说绝对没有，但完全可以说较少受到目前文化界、文学界商业化、人情风污染和政治权力操弄的声音，是一种清洁的声音，是可以信赖的声音。

多年来，笔者有一个一致的观点，这就是无论是搞创作还是搞当代批评，你都必须“在场”，不仅要有相关的史的、基本理论的知识背景，还应该对当前创作、理论、批评的相关脉息和动态，有一个全局的了解和掌握，只有有了这种“在场”的感觉和状态，你才能选择自己的写作方向、参与方式，才能对一个作家作品的价值和意义有一个科学的相对准确的判断。最怕的是那种偶一为之的“走穴”式的“权威”意见，他们对于当代创作的总体或相关方面的创作、理论状态，并不充分了解或甚至有些“隔”，却突然宣称发现了一部旷世佳作。王春林的批评之所以可信，就是几十年来，他始终关注着中国文学界的现状，安居于当代文学之场，他的发现和判断，建立在广泛的同类作品的阅读和

比较之上。他的文章虽然现在仍多是单个作家单篇作品的评论，但从论述中就会发现，他读了同类型的许多作品，又读了同一个作家此前的许多作品，他又掌握了关于这个作家的多少批评文章的主要观点。他的判断和理论延伸，又以多少原创性的理论观点作为依据。这正是王春林的批评具有内在的学理深度的原因之一。作为一个也写些批评文字的作者，我深知将评论文章写得哪怕有些许的学理性并不容易，从而深知这些文章包涵了多么艰辛的劳动，付出了多么巨大的心血。

王春林的批评基本上仍然是历史的社会的美学的批评，但他并不拒绝三十年来介绍进来的西方现代哲学——美学思潮和理论，包括心理学、现代语言学、叙述学、现象学、原型批评、结构主义、后殖民主义文化理论等等。但可贵的是，他的批评并没有成为名词、概念的大展览，而是紧密贴合作品实际，取其合理性的内涵，决无生吞活剥的生涩与隔膜。所以一般来说，他的批评文章是有着充分的自我见解的朴素的批评，是明白晓畅、言能及义的批评，既无云遮雾罩的玄虚，也无装腔作势的深刻。王春林是一个当代文学认真的研究者、参与者、对话者，有着学人的严谨与虚怀，所以他从未有自己掌握了绝对真理的独断和霸道。这正是我们许多人要向他学习的地方。王春林批评文章目前主要的缺点是表达上，严谨有余，灵气不足，可能是追求学理性的副作用之一吧，常常给人以“举重若重”之感。举重若轻，这才是何其芳、王朝闻、萧殷这些老一代批评家的为文境界啊，我们都应该为此而努力。

注释：

①赵本夫《天下无贼》，第148页，人民文学出版社2004年版。

2005年11月13日于西安

目 录

清洁的声音 李星(1)

【 第一部分 年度评述 】

小 引

第一章 于沉稳中前行

——2002 年长篇小说印象 (3)

第二章 走向个性,走向成熟

——2003 年长篇小说印象 (11)

第三章 满目繁花又一年

——2004 年长篇小说印象 (28)

【 第二部分 知识分子精神的勘探与透视 】

小 引

第四章 “说出复杂性”的“反现代化叙事”

——评王蒙长篇小说《青狐》 (57)

第五章 直面历史与伦理的冲突

——评张炜长篇小说《能不忆蜀葵》 (71)

第六章 个人化视域中的日常叙事	
——评韩东长篇小说《扎根》	(84)
第七章 知识分子与革命关系的沉思与表达	
——评李洱长篇小说《花腔》	(98)
第八章 知识分子生存困境的非亲历性阐释	
——评方方长篇小说《乌泥湖年谱》	(115)
第九章 审父与自审的人性诗篇	
——评王刚长篇小说《英格力士》	(128)
第十章 知识分子命运的别一种究诘与表达	
——评懿翎长篇小说《把绵羊和山羊分开》	(144)

第三部分 乡村世界的描摹与展示

小 引

第十一章 乡村世界的凋蔽与传统文化的挽歌	
——评贾平凹长篇小说《秦腔》	(161)
第十二章 底层命运的寓言化表达	
——评阎连科长篇小说《受活》	(187)
第十三章 日常叙事与乡村政治透视	
——评李洱长篇小说《石榴树上结樱桃》	(202)
第十四章 在政治与日常生活之间	
——《创业史》与《从两个蛋开始》的对读比较研究	(217)
第十五章 对现实苦难的直面与承担	
——评尤凤伟长篇小说《泥鳅》	(234)
第十六章 一部透视灵魂的尖锐之作	
——评许春樵长篇小说《放下武器》	(249)

第四部分 历史景观的再现与重构

小 引

- 第十七章 智性视野中的历史景观
——评李锐长篇小说《银城故事》…………… (263)
- 第十八章 叙述、历史及其他
——评成一长篇小说《白银谷》…………… (280)
- 第十九章 对二十世纪中国历史的消解与重构
——评刘醒龙长篇小说《圣天门口》…………… (297)
- 第二十章 人物的重塑与史诗性追求
——再评刘醒龙长篇小说《圣天门口》…………… (317)
- 第二十一章 女性精神的悲情表达
——评蒋韵长篇小说《我的内陆》…………… (338)
- 第二十二章 洞穿女性悲剧的血色哀歌
——评毛守仁长篇小说《天穿》…………… (344)
- 第二十三章 晋商文化的别一种文学想象
——评毛守仁长篇小说《北腔》…………… (356)
- 后记 …………… (372)

第一部分

年度评述

小 引

虽然文学的发展演变并不自然而然地依时间顺序的演进而形成又一个相对的段落，然而迄今为止人类的文学史阶段划分却仍然不能不依赖于人类的时间观念，依赖于人类对于时间的理解与切割。在这个意义上，则所谓2002年度的文学与所谓唐代或宋代的文学其实是同样性质的概念，只不过时间长短有别而已。我们注意到，对于这种年度评述一类的批评文字，学界多有否定性的批评意见。比如吴义勤就认为，此类评论文章“几乎可以说它们是我们的文学评论中最没有创造性、最没有意义的文字，那些大而化之的‘归纳’，既不是真正的文学研究，也与文学发展的实际相去甚远，纯粹是一次又一次的‘话语浪费’，是批评家自娱自乐的话语表演”。在他看来，导致此种情形的原因，“一是这类文章好写，它无须对文本有真知灼见，是一种能‘藏拙’的文体”“一是这类文章符合中国人的思维习惯。”^①需要特别说明的是，吴义勤此处中国人的思维习惯特指一种“类比式”的归纳思维。应该说，如吴义勤所言此类“不及物”的批评确实存在，但这却并不能构成由此而完全否定年度评述这种文体的根本理由。根据我的批评体会，我自己的此类批评文字乃是全部建立在对于文本具体而深入的解读基础之上的，这一点有以后几部分的文字为切实的例证。虽然不能保证自己对文本有着如吴义勤所要求的“真知灼见”，但从文本出发，将自己的年度评述文字完全建立在深入细读文本的前提之上，却又确实是一种不容否认的事实存在。就我的理解而言，只要充分地尊重作家的文本个案，一切的概括与分析均着实地依赖于对于文本的细读研究，那么这样一种年度评述的批评文体则也肯定会体现出其自身的价值来。而这，也正是我曾经撰写年度评述类批评文字，此后也肯定还会不时地撰写此类批评文字的根本理由所在。

注释：

①吴义勤《批评何为？——当前文学批评的两种症候》，载《文艺研究》2005年第9期。

于沉稳中前行

——2002 年长篇小说印象

虽然在 2002 年的中国文坛也并不乏一些优秀的中短篇小说出现，其中比如孙惠芬之中篇《歇马山庄的两个女人》、毕飞宇之中篇《玉秧》、迟子建之中篇《酒鬼的鱼鹰》、李冯之中篇《信使》以及王安忆于这一年度陆续在《收获》、《上海文学》等刊物集中推出的一系列堪以精致称之的短篇小说，都是相当引人注目的作品。然而，从这一年度中国小说界的总体创作态势而言，作家们的主要创作精力依然放在了自 1990 年代以来就已经占据了小说界中心位置的长篇小说创作上。或许是因为长篇小说一向被理解为厚重的记载时代生活的里程碑的缘故，在作家们潜在的创作心态中，其实一直都在把能否写出一部或几部优秀的长篇小说当作自己的一种追求目标。在 2002 年，中国的小说家们继续以饱满高涨的热情从事着长篇小说的写作。就笔者对于此一年度中长篇小说的追踪式阅读而言，可以从以下几方面来概括这一年的长篇小说创作。

首先，自 1990 年代中期以来便呈方兴未艾之势的“新历史小说”，在这一年度依然成为许多小说家们的创作选择。虽然同样是着眼于对历史的探究与表达，“新历史小说”与传统历史小

说最根本的区别乃在于其人物与故事完全是虚构出来的。在这一方面，2002年度值得注意的作品有李锐的《银城故事》、李洱的《花腔》以及张一弓的《远去的驿站》等。李锐迄今为止的小说创作可以划分为两个系列，一是以《厚土》、《无风之树》为代表的吕梁山系列，一是以《旧址》以及这部《银城故事》为代表的银城系列。吕梁山系列的基本故事背景是文革，而银城(李锐之故乡为著名盐城四川自贡，银城明显有着自贡的影子)的基本故事背景则是近代以来的中国历史。然而，同样是对于既往历史的探寻与表现，但《银城故事》较之于十年前的《旧址》却已经有了明显的超越。在我看来，这种超越乃主要体现为李锐历史意识的走向成熟。在《银城故事》中，通过对于刘兰亭、刘振武、欧阳朗云、刘三公、聂芹轩等革命与非革命者都在一次流产的同盟会起义中走向了与初始动机截然相反的结果的描写叙述，李锐既对复杂幽深的人性进行了深入的探寻，也极为有力地还原了历史演进过程本身的荒谬与无秩序。但更为值得注意的却是李锐对于银城普通百姓生活的大力铺陈，是他给予了旺财这样一个其实与这次同盟会起义了无关系的小人物以很大的篇幅。这期间透露出的乃是李锐历史意识的另外一个层面，那就是除了一部充满鲜血与杀戮的所谓革命的历史以外，其实还存在着并不为人所注意的民间自为的历史。同样是对历史的探寻，青年作家李洱《花腔》的价值一方面表现为对于中国现代革命史上知识分子与革命之间的复杂关系的思考与表达，作家通过对葛任形象的成功塑造，而对潜藏于其内在精神深处的知识分子伦理与革命伦理之间尖锐激烈的矛盾冲突的捕捉与表现，正可看作李洱思考的独特深刻处。此外，通过对于小说文本叙述方式的独特设定，通过对三种不同叙述层次(第一层次是作为葛任后代的“我”，第二层次是白圣韬、赵耀庆和范继槐这三位与葛任有过交往的当事人，第三层次则是作品中引用过的诸如黄炎、田汗等多达十余人的史料记

录)的叙述者的设置,以一种同样十分复杂的叙述方式而达到对于历史本身之复杂性的呈示重现则可被看作《花腔》艺术价值另一个方面的表现。用张一弓自己的说法,他是把本来可以以三部长篇小说来加以表现的三个家族的故事全部浓缩进了这部只有二十余万字的《远去的驿站》中。小说通过对叙述者“我”的设定,将“我”的母系家族、父系家族以及姨夫贺氏家族在20世纪前半叶的命运错综复杂地交织在一起,既呈现出了偶然因素与必然因素相混杂的历史发展演变过程,同时却也相对成功地塑造出了如三姥爷、大舅、老爷爷、莲子、贺爷、贺胜、贺石等一系列足堪以丰满称之的人物形象。而正是这些因素的具备,使得《远去的驿站》差不多可以被称为一部史诗性的作品。

其次是出现了一批密切关注并思考当下现实生活的作品。在近几年来,作家对于急速变化着的现实似乎失去了把握和驾驭的能力,因而文坛所强烈需要的便是能较好地理解并把握当下时代现实生活的优秀作品。这一点在2002年度的表现虽难言已有很大的改观,但却毕竟出现了一些差强人意的长篇小说。这一方面,值得注意的作品有尤凤伟的《泥鳅》、王安忆的《上种红菱下种藕》、张者的《桃李》、艾伟的《爱人同志》、莫怀威的《经典关系》、苏童的《蛇为什么会飞》等。其中尤凤伟《泥鳅》关注表现的乃是打工农民进入城市后所必然遭遇到的歧视与屈辱问题。作品中,由于进城后所遭遇的种种打击,主人公国瑞与他的同伴们或者铤而走险走上抢劫犯罪之途,或者被迫堕落以出卖自身的肉体为生,或者干脆在精神错乱后住进了精神病院,几乎无一例外地走向了悲剧性的人生结局。小说标题“泥鳅”应该被理解为是这些打工农民的象征,一种名为“雪中送炭”的菜肴被城市人的象征者宫超等人大口吞噬的描写则可以被理解为是对国瑞及其同伴们无法逃脱命运之网捕捉的一种恰如其分的艺术性再现。虽然也有论者对于作品后半部中相当明显化了的传奇式倾向

的真实性提出了质疑，但从总体创作倾向而言，在当下时代中，如《泥鳅》这样直面现实生活中底层民众生存苦难的作品并不是太多而是太少了，文坛需要的正是如《泥鳅》这般突出地体现作家艺术良知的优秀作品。王安忆曾经一度沉迷于旧上海的往事之中，一部《长恨歌》确曾引得批评界好评如潮。但在《长恨歌》之后，她又将表现视野投注到了当下时代的现实生活之中。《上种红菱下种藕》篇幅并不算大，故事情节也难言曲折激烈。在十多万字的篇幅中，王安忆以其特有的敏锐细腻极为细致地描写着江南小镇的生活变迁，展示正在上小学的幼小女主人公细微的情感心理变化。早年的王安忆是以儿童文学的创作而步人文坛的，能够惟妙惟肖地逼真再现少儿的内在心灵世界乃可以说是王安忆所独具的一种艺术优势。她的这部《上种红菱下种藕》的成功正取决于她艺术上的这一优势。然而，虽然作家的艺术聚焦点只是对准了一位少儿的心灵世界，但王安忆之最值得肯定处却在于她成功地借助于这个少儿的心灵世界对当下处于急遽变化中的现实生活进行了足堪以精确到位称之的艺术折射。一滴水可以反映太阳的光辉，王安忆则可以借一个少儿的心灵世界表现她对于时代现实生活独到深入的思考。与本文中提及的其他作家相比，柯云路是一位曾经走失的作家，《龙年档案》在2002年的发表，在某种意义上标志着这位走失作家又重新回到了纯文学的阵营之中。张者的《桃李》是一部关注表现现时代大学校园中的知识分子生存与思想精神状况的长篇小说。曾有论者将之与钱钟书的《围城》和杨绛的《洗澡》相提而论。实际上，就其所达到的总体思想艺术水准来看，这部小说根本无法望钱杨二前辈之项背。在我看来，张者《桃李》的主要价值乃在于通过对一系列知识分子形象(既有教授、博士、硕士，也有本科生)的成功塑造，有力地揭示了当下时代以欲望的膨胀为主要表征的物质消费思潮对于大学校园——这一思想精神最后的“桃花源”的彻底侵入。“无

论是邵教授，还是李雨、雷文、孟朝阳，或者蓝娜和刘唱。他们人生中的大部分时间，都辗转于物质和性之间；比起做知识和精神的宠儿，他们似乎更害怕自己被消费社会的潮流所抛弃。他们比谁都更努力地物质和性而奋斗。”^①知识分子当然也有七情六欲，因而同样面临着来自于欲望消费时代的必然冲击，但在另一个方面，知识分子也应该在精神思想方面保持一定的超越性品格。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认为张者的《桃李》对于当下时代被欲望所四面围拢着的知识分子有着足够的警示作用。

第三是对于爱情与婚姻生活有了更多的关注与表达。或许是因为对爱情与婚姻的关注最易扣动读者的心弦，或许是作家自身对于男女间情感有着过多的体验与期待，在2002年，婚恋题材的长篇小说数量可能是最多的。其中值得注意的有贾平凹的《病相报告》、刘建东的《全家福》、万方的《香气迷人》、程青的《恋爱课》、李修文的《滴泪痣》、《捆绑上天堂》、荆歌的《鸟巢》、《爱你有多深》、盛可以的《水乳》、戴来的《练习生活练习爱》等。贾平凹的《病相报告》展示的是一对恋爱持续长达几十年之久的堪称缠绵复杂的爱情经历。据贾平凹称这是一个有生活原型的爱情故事。几十年来，虽然社会政治风云几经变迁，虽然男女主人公也经历着各自的生活坎坷，但惟有他们之间那种真诚牢固的爱情没有丝毫的褪色。虽然《病相报告》在贾平凹的小说创作中并不属于第一流的作品，但在这样一个情感易变杯水主义盛行的时代，如贾平凹所咏吟的这种几十年不变的真诚情感，应该还是有着相当针对性效应的。万方的《香气迷人》中对爱情的书写则带有几分明显的神秘气息，主人公方刚在爱情上的几经周折所凸现出的正是爱情的复杂与难解所在。爱情的真谛是什么？爱为什么会于悄然不觉中变为不爱？原先的不爱又如何不知不觉地转换为了挚爱？如此种种的问题恐怕都在万方的思索与表现范围之中。在这个意义上，《收获》编辑叶开以《爱要怎样说出

口》为题评价万方的《香气迷人》，应该是相当符合小说文本实际的。然而同样是女作家的作品，程青的《恋爱课》所呈现出的却是一种鲜明的女性主义立场。作品中的女主人公陈陈在不长的时间内先后经历了北星、大梁等几位不同的男性，结果均未能获得真正的爱情。当陈陈最后被迫无奈地与自己其实并不喜欢的祁老师结合的时候，她对于男性世界的失望可谓达到了某种极致。由以上这些作品中所反映出的当下中国的婚姻爱情状况来看，似乎确实出现了某种令人担忧的病症，这种病症的主要表现便是爱的能力的明显匮乏。我们在此无意于当然也不可能给出这一问题一个答案，但另一个值得注意的问题却是，这样一种爱的能力匮乏的病症理应得到更多中国作家的关注，中国作家理应为读者奉献出更优秀的婚恋小说作品来。

第四是出现了一些在小说文体上有所创新，提供了某种新的小说文体因素的长篇小说。2002年，在这一方面特别引人注意的作品有韩少功的《暗示》、懿翎的《把绵羊和山羊分开》、徐庄的《废黄河》、叶兆言的《没有玻璃的花房》、麦家的《解密》、潘婧的《抒情年华》等。当然，在我们强调上述作品在文体方面有所创新的时候，也并不意味着前面提到过的作品便没有在文体上值得注意的地方。事实上，前述表现历史、现实以及婚恋的作品中，一些小说也同样有着文体上的值得注意处。比如李锐之《银城故事》以一首唐诗：“黄河远上白云间，一片孤城万仞山。羌笛何须怨杨柳，春风不度玉门关”来统领结构全篇，李洱之《花腔》设计了三个层次多达二十余人的叙述者，尤凤伟《泥鳅》中几种不同文体杂陈并用，也都是相当引人注目的文体创新。只不过相比较而言，这些小说更多地以对历史或现实、婚恋的表现而更加令人关注而已。在如上所述文体有所创新的作品中，最值得注意者当为韩少功的《暗示》。早在几年前，韩氏就曾经以一部《马桥词典》而引起批评界的众声喧哗，在文坛掀起了一场轩然